

DUAN PIAN XIAO SHUO JI

短篇/小说/集

HONG WU

红
雾

孙立宪\著

华文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红 雾

孙立宪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京〕新登字 064 号

红 雾

孙立宪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1993年12月出版 199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075—0287—2/1·35

定价:5.60元

目 录

红 雾	(1)
故 魂	(45)
黄土镇上的纵火案	(62)
黑 峪	(76)
幽 谷	(88)
神 惑	(119)
古城墙	(136)
芙蓉树	(145)
梦	(152)
反 醒	(162)
姑 姑	(168)
魂归桃树林	(181)
断 层	(186)
起风了	(208)
出 逃	(224)
妈妈,你等着我	(243)
归 途	(258)
这里,有战士在守卫	(270)

红 雾

父亲死了。他死在按级别本不该他住的高干病房。

父亲的一生可敬可叹可放声大笑可顿足痛哭。从前，那些认识父亲同时又知道他是我儿子的人，总是对我感叹道：“你父亲那可是个人物！”

我也知道，父亲是个人物。他若早生十年，保准成为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成为和蒋介石作对或打共产党的大军阀；他若是不下关东而去闯南洋的话，这当儿没准是个腰缠万贯又回来投资的爱国华侨。

父亲的级别不高；父亲的资格很老；父亲的许多老战友都是身居要职的大人物；父亲是省直机关里赫赫有名的大能人；父亲和省委书记是同县同村的老战友；父亲能堂而皇之地进出中南海。

当父亲即将告别人世的那一霎，他目光呆痴地望着屋顶。大概他又记起了他逃出家乡的那个遥远的夜晚，记起了他带人砍了伪保长一家的情形，记起了他的队伍由“抗日保家团”编入八路军的过程，记起了他进城的那天晚上几个人在南门下的小酒馆里喝得大醉如泥的情景。

父亲死了。抢救父亲时搬来的那些医疗器械还在。写字

台和窗台上堆满了尽是洋字码的空药盒子。我真不敢相信，父亲竟象一盏燃尽了油的灯渐渐地熄灭了。

窗外夜色凝重黑暗。光线暗淡的病房里静寂无声。母亲站在病床前，失神地注视着父亲那张黑瘦的仿佛睡熟了的脸。我则站在母亲身后，不知所以。我和母都没有哭、也不知此时该不该哭。

这当儿，那个十分漂亮并常使我产生邪念的护士来了。她用指头戳我一下，说内科主任找我有事。我跟在她的身后，贪婪地吞食着她那优美的身材。内科主任是个又瘦又小的丑老头，他叫我在他对面坐下，随后便用悲哀的口气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我说：“我知道。”

主任苦笑了一下，递给我一张表格叫我签字。他说：“本来该叫你母亲签字的，可她太悲痛，不好去打扰她。”

表格是一份死亡证明书。我说，这表格谁签字都一样，父亲决不会因为手续不符而起来抗议。

女护士笑了，迷人得很。

离开值班室的时候，主任似乎有点为难地对我说：“我们得尽快把他送太平间。你不知道，这里每次死了人，病员们的情绪总要好久才安定下来。”

果然，走廊上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在嘀咕。我经过他们身边时，都不作声了；我一过去，他们又说开了。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端来一盆热水，用毛巾给父亲擦着脸，还要给他擦一遍身子。我帮着，不时地把父亲掀来掀去。一股异常的气味扑鼻而来，我好几次差点吐出来。

一种不满情绪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父亲有七个子女，眼下

却就我一人忙活。

听姥姥说，父亲是因为赌钱把家里的地契输了，才下关东的。姥姥有四个儿子，但晚年以后一直住在我们家。她对我谈到父亲的时候总是贬多褒少，决无赞美之辞。可我觉得她的话可信，可信程度远远超过那些摆起来比父亲还高的他本人的档案材料。

父亲家里很穷，从乾隆时代就是合格的贫下中农。但不知父亲何以染上赌博的恶习。他十三岁开始赌，十五岁多一点就把家里的地契偷出来，跑到村东头王麻子家里押了注。当时父亲已经输得拉下一屁股债，他想一下子翻回本来。然而，十分不幸，父亲非但没赢反而把地契也输了。

时值古历腊月二十八，大年临近，雪封了山。父亲急了，脸涨得象猪肝，指着王麻子骂咧咧地说：“你小子等着，两年以后，我叫你输个屁蛋净光！”

事实上，王麻子以后并没有输得屁蛋净光，而是和父亲一起拉了队伍，当了父亲的军师。再以后，人家步步高升，当过参谋长，当过市长，眼下正在风光秀丽的青岛安度晚年。

父亲骂完誓，抬腿走了，从王麻子家径直去了关东。

爷爷是第二天早晨发现父亲失踪并知道地契落到王麻子手里的。他问清了地契押的钱数后，便疯了似的东凑西借，三天之内终于凑齐了十块大洋。

姥姥说，王麻子这人贼得很，别看他以后当过什么市长。本来，父亲是把地押了八块大洋，可他硬说是十块。明眼的人都有数，那二亩山地值不了十块大洋。但无人作证，爷爷只好吃个哑巴亏，从王麻子手里赎回地契。

若干年以后，我去祖辈们生息繁衍的家乡时，惊异地看到它是一个被群山层层包围的小村庄。村庄距离县城大约七、八十里，到父亲扒火车下关东的车站就更远了。那天大雪封山，漆黑一片，我猜不出父亲是怎么走出这群山的，猜不出他途中曾遇到过什么困难。这段经历，父亲从来不说，也不提下关东的事。如果姥姥不讲，也许在我眼里父亲会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生来就是为打鬼子救中国的共产党员。

父亲走了。他一去就是七年。在爷爷、叔叔以及他的老婆孩子被日本人活埋了的第二年，父亲才从关外回来。

母亲从父亲身上擦下不少泥，一根一根地落在床单上，象无数条蚯蚓。

这时，太平间来人了。运尸车直接推到床前。米人是个大个子，黑脸膛上也象死人似的毫无表情。他先抬起父亲的上身，然后向我递了个眼色叫我去抬父亲的下肢。母亲把父亲的衬衣扣好后，我抬起父亲把他放在车上。父亲很轻，两条腿就象是枯树枝。

运尸车乘电梯从三楼降到一楼，长长的走廊上出奇的静，昏暗的灯光照出一条冰冷可怖仿佛通向地狱的路。我的手搭在车上，离父亲的头只有几寸远，耳边响着咯嚓咯嚓小鬼磨牙似的车轮声。

太平间很远，走出长廊，又左拐右拐地经过几条无灯的路，终于在一个封闭式的大门前停下。黑大汉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拿出一串钥匙，把门开了。

没进太平间之前，我以为里面一定阴森可怕，象低级旅社的大房间一样满是床和躺在床上的死人。进来一看，不是那

样。里面干净整洁，全是一格一格如同中药房里盛药的格子样的大铁柜。

黑大汉哗地一声拉出一个巨大的铁抽屉，他也不叫我帮忙，只把运尸车的另一端高高掀起来，父亲就顺从地往下滑，嘭地一声掉进那个大抽屉。随后，他又抬起脚使劲一蹬把它推进去。父亲不见了，眼前只剩下这黑大汉和无数个关着的大抽屉。这时，我才领悟到：整个社会都步入现代化了，也包括这太平间。但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落后的太平间。

黑大汉写好了两个标签样的东西，一个插在装父亲尸体的那个大抽屉上，另一个给了我。我知道自己该走了。但忍不住想和黑大汉啦啦。

“这太平间是高干专用吧？”我问。

黑大汉斜了我一眼，没吭声。父亲死在按级别本不该他住的高干病房，如果死后又停放在高干太平间，也无疑对他是一种荣耀。

父亲从关外回来时，没敢回村里。他先是在一个亲戚那儿藏了几天，后来才趁着天黑偷偷地潜到王麻子家。

爷爷他们被日本人活埋的情景，姥姥亲眼所见。她至今一讲起来，仍叫人毛骨悚然。

头天，叔叔回来的时候，姥姥还和他啦了一阵子呱。当时，叔叔已经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十四旅，是回来催缴军粮的。

最初听姥姥讲这些事的时候，我还小，满脑子尽是疑问。后来才知道，抗战时期，沂蒙山既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的根据地，日本人不光杀共产党也杀国民党。

叔叔在姥姥送来的米袋里抓了一把米，仔细地看了看又

吹了吹，然后笑着说：“三婶子，这米碾得不算干净呀。”

姥姥答应马上碾一遍，于是叔叔便主动地帮着推起碾来。

那天下午，天傍黑了，缴上来的粮才有五成多。这中间是不是保长做了手脚，不得而知。

“你就在家住一宿吧，等明天收够了粮再走。”

姥姥听着保长这样对正推碾的叔叔说。事后，人们根据这句话作出判断：保长有意设了圈套。

天没亮，日本人就来了。六十多岁的黄四爷，家境并不贫寒，但有每天早晨出去拾粪的习惯。他一出村口，就看到远远而来的日本人。当时他如果站下不动，日本人或许不会对他怎样。可他慌中失措，扔下粪筐就往回跑。他听见日本人在喊叫，也听到擦过头皮的枪声，当跑到场院边上的时候，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脊背。直到日本人出村之前，黄四爷始终脸朝下趴在那儿。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了鲜血的鸡毛。天黑前，他的两个儿子用扫帚赶开成群的苍蝇，把尸体抬回家去了。

然而，叔叔他们却比黄四爷多活了不少时间，枪响时，村里好多人都听到了，爷爷也听到了。爷爷披上破棉袄，去敲叔叔的门。叔叔大概夜里房事太多，他睡得很死。等他听见爷爷敲门后爬起床来，日本人已经冲进院子。

村民们把爷爷他们的被害，归咎于保长的告密。有人说，保长是打发他的闺女连夜跑了几十里到镇上去报告给日本人的。

村里的人都被召集到场院里观望，他们的面前躺着死了的黄四爷和五花大绑的爷爷及叔叔。多少年以后，人们仍然忘不了叔叔那镇静的神态，但却蔑视婶子那副怕死的可怜相。姥姥说，婶子一直哭哭啼啼地跪着日本人的面前，求告别杀了他

们。

场院的四周有日本兵把着。人群中传出孩子的哭泣。在令人恐怖的气氛中，空气也显得稀薄了。

这期间，十几个庄稼汉一直在不停地挖着一个大土坑。已经挖到齐腰深了，日本人还催着他们挖。村民们不知道那坑用来干啥，如果把爷爷他们枪毙了以后埋葬的话，决然不用那么深。

太阳爬上屋脊的时候，日本军官叫挖坑的人住手。接着，爷爷他们分别被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拖过来，推进土坑。婶子没命地嚎叫着，怀里紧紧地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一个日本兵去夺孩子，婶子不松手，并在日本兵的手上咬了一口。一只大狼狗冲上去，把婶子的脸上胳膊上咬得血肉模糊，而后，叼着孩子的一条胳膊回到日本军官的身边。军官向狗挥挥手，它竟把手指还在抽搐的那条胳膊吞下去。婶子昏倒在土坑里，孩子也听不见哭了。叔叔张口大骂，把日本人的老祖宗骂得狗血喷头。

十几个庄稼汉在日本人的威逼下开始往坑里铲土。土埋过了爷爷、他们的脖子，脑袋变得象血紫色的皮球。一个日本兵走过去用刺刀在爷爷头皮上轻轻一戳，立刻有一股鲜红的血柱冲天而起。他挨着戳，最后一个轮到婶子。事后，村民们说，数婶子喷的血柱高而且时间也长。

我从太平间回来时，母亲正对着那张病床发呆。我在她身后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妈，该回家了。”

不到凌晨三点，整个城市都在睡。空荡荡的大街上，就我和母亲在走。离开病房的时候，母亲想把父亲用过的几件东西

带回来，被我阻止后，全部扔进了垃圾桶。

一进门，母亲就躺在床上。她太累了，几个月来，她没睡个安稳觉。然而，我担心她这一躺下会起不来，眼下还有许许多多的事等着她来应酬。

“别忘了给你二哥拍个电报。”母亲又睁开眼提醒我。

“忘不了。”我说。

我不仅要给二哥拍电报，还要把大哥大姐连同三个妹妹都叫回来。这段日子里，我可受够了。他们都在外地，只要来封信问问就算尽了孝心，而我却忙里忙外地跑了几个月。

父亲并不喜欢我，母亲偏爱的也只是二哥。说实话，我小时候没尝过多少父母的爱。有的只是屈辱、饥饿以及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我有些恨父亲。他在摆脱了困境成为人们公认的大能人时，曾为别人的孩子办过出国留学，并利用种种关系把一个个满肚子糠草的家伙塞进那些令人眼红的机关。然而，他对我却不管不问，认为我的差使是满不错的。有一段时间，为了感化父亲，我常常给他买扒鸡炖王八，千方百计讨他欢心，叫他也把我弄到国外去开开眼界，但仍以失败而告终。父亲认为我在外国只能流浪而决留不了学。

母亲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着，大概睡着了。我也想去睡一会儿。天一亮，好多事等着我去做，还得先通知一下社科所。社科所对父亲不错，换个单位，他住高干病房是不能报销的。

大概四点多了吧？我心里想。此时，人睡得正香。

父亲带着人翻进墙头时，保长一家毫无觉察。当时没钟表，他们是等到寅时开始行动的。王麻子紧跟着父亲，后边还有四五个脸上涂了草灰、手提大刀的男子。

姥姥说，父亲从关外回来的时候，带回不少钱。对钱的来历，村里人猜测不一。有人说父亲在关外当了土匪，钱来得不干净；也有人说父亲在森林里挖了几年参，是一点点积攒下的。

父亲忘了那年把地契输给王麻子时骂下的誓言。一见面就掏出一大把钱叫王麻子去备酒席，然后把以前的赌友们全部请来。在大伙儿喝得正热闹时，父亲把杀掉保长拉队伍打鬼子的想法一说，都一致赞成，有人还骂娘起誓。

父亲抬起腿一脚踹开门，六七条杀气腾腾的大汉闪电似的冲进去。黑暗中，父亲抡起大刀往炕上大砍特砍，只听见喀嚓喀嚓切西瓜似的声响，并有一股股热呼呼的液体溅到脸上。整个过程不过一分钟。随后，父亲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在屋里巡视了一遍，当确信屋里没有活人时，便带着大伙儿离开现场直奔大青山。出门时，父亲把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放在门口。纸条上说：这是逼日本人当汉奸的下场。署名便是人们以前没听说过的“抗日保家团”。

姥姥说，父亲刚开始拉队伍那阵子，就和叫花子没两样。父亲常来村里招兵买马，要衣要粮。和父亲同祖的二秃子，在村里也算富户，四个儿子在家里种地。按辈份，父亲叫他二叔，为了动员他出一个儿子参加队伍，父亲磨破了嘴皮。最后，他干脆蹲在二秃子的门口不走了。

“大侄子，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二秃子可怜巴巴地说。

“打鬼子灭土匪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亲气哼哼地说：“明儿要是土匪来把你四个儿都绑走了，看你咋办！”

二秃子担心得罪了父亲，日后招来麻烦，无可奈何地说：“我给你一个人，那些地咋种？”

父亲拍着胸脯说：“地要是种不上，我带人来帮你！”

二秃子没法了，把他的三儿子从屋里喊出来。他这个三儿两条腿不一般长，走路一踉一跄的，平时就不愿意干庄稼活。

“你愿跟着你哥走吗？”二秃子问。

瘸子点了点头，于是他便跟着父亲走了。

多少年以后，瘸子成了军区总院的副院长。我见过。他尽管走路一踉一跄，但却极有派头。

不过，父亲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象对二秃子那样客气。村里最富的人家是李贵，家里藏有钢枪。父亲几次捎信，叫他捐出两条枪。李贵置之不理。父亲火了，派人把他家的几十只羊全部赶去，还扬言要绑他的票。结果，李贵马上交出两条枪，还搭上几匹白洋布。

有一次，我趁父亲高兴的时候，问道：“你的队伍最旺时有多少人？”

“三百多，”父亲说：“人数不定，常常有人开小差。如果队伍走远了，一看不见大青山，就有人跑，等队伍拉回来时，他们又来了。”

我想，那些人都是恋家的缘故，抗日保家团也没有惩治逃兵的纪律。当时，谁也没有胸怀全国放眼世界的觉悟。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醒来时，听见母亲和人在会客间里说话。母亲握着手帕，不时地擦泪；社科所的郑所长也长吁短叹，眼睛湿湿的。

郑所长说，他是从医院里听到噩耗的。叫我们抓紧把父亲的生前好友排出一个名单，所里准备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尽早把讣告发出去。

我说，等二哥回来再排吧，父亲的生前好友太多，我不知怎么排好。郑所长表示同意，他们先做着其他工作。接下来，他又和母亲商量给父亲买什么样的衣服。我没兴趣听，便离开了。

这个郑所长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以前是个行政秘书，很得父亲的赏识。为了把他提成所长，父亲在离休前，几乎天天找组织部。

六年前，父亲快六十岁时，突然想离开省委办公厅，到市里正筹建的社科所去当所长。市委书记是父亲的老熟人，表示欢迎，巴不得利用父亲的关系早一点把社科所建成。但当时全家人都表示反对，说他不该在这个年纪再去操心费力。

然而，现在看来，父亲的主张是对的。在省委机关里，他是无数名处级干部中的一名，住房，用车都排不上号。一来社科所，足足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住上了，小车随叫随到。当然，父亲也为社科所出了大力，使一个清水衙门变成全市最惹人羡慕的单位。

父亲的队伍由抗日保家团改为八路军沂河支队第十一分队的前一天夜里，他喝得酩酊大醉。清晨，号声嘹亮，队伍在遍地鹅卵石的河滩上集合。几百名睡眼惺松、破衣烂衫的汉子呈扇形围着父亲。

那条后来闻名全国却干涸了的沂水河，从队伍的后边流过，清澈，湍急，腾起淡淡的水雾。

父亲还未从醉梦中醒来，摇摇晃晃险些摔到。两个护兵伸手扶住他，却被父亲两臂一挥，差点把他们掀到河里。

“兄弟们，”父亲咽下一块翻上来的油乎乎的猪皮，宣布了

后来才知道是最庄严最重要的决定：“从今天，咱改名叫沂河支队第十一分队，归八路军管了。”

大伙儿不关心归谁管，只要管饭就行。当时，有的听到了，有的没听到。大部分人都好奇地斜着眼打量站在父亲身后的那个外乡人。他们知道，这个外乡人昨天夜里和父亲关着门喝了一宿酒。

近几年来，那几百名汉子中的幸存者仿佛才从梦里醒来，找到父亲绞尽脑汁地去回忆那个当时无所谓、如今却关系到离休以后享受什么待遇的关键日子。

“那天是六月十六。”姥姥说。早上姥姥上山拾草，正碰上队伍在河边集合，下午她就生下了八舅。对此，父亲表示了异议：那时候队伍常在河滩上集合，谁知她碰上的是那一次？但由于找不到更准的根据，最后便把姥姥提供的时间，分别载入了他们所填的表格。

当时，都没想到那个外乡人是延安派来开辟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姥姥说，那人叫王伟，曾经和父亲在关外干过土匪。这话，我不信。王伟后来是我们家里时常议论到的人。在父亲的战友中他的官最大，当过中央某部委的领导人。他的样子怎么也不象干过土匪，即便干过，也是组织上派到土匪队伍里的地下党。

队伍改编后，父亲当队长，王伟是党代表。这期间，打仗不多，他们为党保存下一支有生力量。最后，他们编入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时，才开始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

兄妹们都陆续回来了。最先到家的是二哥。母亲一见到二哥就哭。自父亲咽气后，这是母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在我

们兄妹七人中，母亲最疼爱的是二哥。这大概是因为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二哥懂事、能体谅母亲的缘故。

和二哥相比，我狗屁不如。他有雄心大志，能说到做到。我小时曾听见二哥咬牙切齿地说过，将来一定要当大官。果然，他四十不到，便当上县委副书记了。

二哥安慰了母亲一阵子，就和我一起排列父亲生前友好的名单。郑所长已经来过两次电话催要。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二哥抽完了手里的烟，对我说：“你写，我念。”

第一个就是省委书记李明。我说：“他能参追悼会吗？”

“写上，来不来由他。”二哥道。

李明和父亲是同县同村的老战友，是那个被父亲赶走了羊的李贵的大儿子。父亲拉队伍时，李明在邻村当教书先生。他参加革命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时，一个暗中为父亲他们通风报信的人来找父亲，无意中提到李明时，说：“那小子没多大活头了，明天早晨日本人就逮他。”父亲问为啥，那人说：“他上课时说日本人的坏话，叫人给告了。”

逮李明，这本不关父亲他们的事。可父亲为了得到一个知书识礼的人，便叫王麻子连夜去把李明叫到山上来。谁知这一下，人家便投笔从戎，先是写写画画，后来竟成了省委书记。

整整一个下午，二哥提名，我记。纸上已经有四五百个名字。这些人中自然少不了原青岛市长王福成（就是那个王麻子）；也少不了军区总院副院长黄力（就是那个瘸子）。

二哥慢慢地翻着父亲遗留下的那几本通讯录，找那些我们曾见过面或听父亲提到过的人。有些人熟悉的职务大得吓人的，二哥不敢叫我记，担心把名单交给社科所以后，人